

白鶴梁

題刻人物匯考

王曉暉 著



天

白鹤梁

题刻人物汇考

王晓晖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鹤梁题刻人物汇考 / 王晓晖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28-0550-5

I. ①白… II. ①王… III. ①历史人物—列传—中国
IV. ①K82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507号

白鹤梁题刻人物汇考

王晓晖/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冠宏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13 千字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550-5 定价: 29.00元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基于石刻文献的唐宋巴蜀水社会研究》
(15xzs002) 阶段性成果

长江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平台建设资助项目

前 言

一、白鹤梁简况

白鹤梁,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区长江边的一道天然石梁。白鹤梁全长约 1600 米,宽 10 至 15 米,距离长江南岸约 100 米,距离长江北岸约 400 米,自西向东延伸,呈一字形与江流平行,止于长江与乌江交汇处。在历史上,每逢长江枯水时节,白鹤梁就会露出水面。近年来,由于三峡大坝蓄水,白鹤梁已永沉江底,只有从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才能看到石梁的一部分。1980 年,白鹤梁题刻成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白鹤梁上,有自唐代以来的题刻文献近二百段,除文字外,还有石鱼、观音像、白鹤图等造像。根据记载,题刻开始于唐代,至宋代形成高潮,宋代题刻占到白鹤梁题刻的绝大部分,此外元、明、清、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有若干段,还有部分年代不详。这些题刻,大者两米见方,小者不足一平方尺,文字多者达二三百字,少者不足十个字。

题刻主要记录了自唐代广德年间以来,因长江水位下降而白鹤梁上所镌刻的石鱼露出水面的情况,实为长江枯水记录。题刻

中有枯水水文研究价值的一百余段,记录了历史上七十余个年份的枯水水位,由此可见自唐广德年间以来千余年长江枯水水位统计和枯水现象发生的周期,对古代相关地区农业生产、长江航运等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也为今天长江水利、水电、航运及周边地区农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同时,题刻内容还涉及年号、人物、官称、诗歌等方面内容。

二、长江师范学院白鹤梁石刻文化研究中心简况

长江师范学院是白鹤梁所在地的唯一一所本科院校,长期以来对白鹤梁石刻文献极其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系、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对白鹤梁本体及白鹤梁与易理文化、石鱼文化等进行了探讨,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在长期对白鹤梁进行关注和研究的基础上,2013年,长江师范学院历史学系向学校申请成立专门性的研究机构,2014年,白鹤梁石刻文化研究中心成为长江师范学院第一批科研创新平台之一,并在学校的经费和政策支持下,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第一期建设。

白鹤梁石刻文化研究中心建设是按照重庆市“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中“一核两带多节点”总体构架的要求,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梁题刻”而打造的区域文化名片,也是长江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呈现。

白鹤梁石刻文化研究中心积极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创新性综合研究,开展以白鹤梁为核心、围绕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水事文献整理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开展长江中上游地区墓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开展长江中上游地区宗教类文献的整理

和研究,积极进行以石刻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文学艺术研究,旅游资源开发、成果创新应用。

研究中心汇聚了一支年富力强、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与本校两个市级重点人文社科基地、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周边区县文博单位形成了稳定的协同创新机制和多层次、多学科的集成优势。通过学校专项资金的支持,积极进行基础设施、文献资源、人才队伍和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在未来形成以长江中上游地区水事文献研究为特色,建成高水平的水事文献整理研究基地、提供文化资源的服务基地,为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提供准确、系统的数据库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为建成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奠定坚实基础,逐步建成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石刻文献和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为白鹤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持,从而促进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为地方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推动经济文化繁荣。

三、本书撰写基本原则

白鹤梁题刻涉及人物众多,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吏。对相关人物的考察,早在清代姚觐元《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中就已经开始^①,陈曦震、曾超、王晓晖、黄海等也通过对白鹤梁题刻文献的整理和校注,对其中的人物进行考察,但限于体例,都比较简略,这

^① (清)姚觐元《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一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对充分利用相关资料带来了不便。^①另外,白鹤梁题刻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人名,对人物事迹进行细致的考察,了解其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白鹤梁题刻。因此,对白鹤梁题刻中涉及的所有人物进行考察,是充分利用白鹤梁题刻资料展开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本书撰写中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 对人物的考察肯定其身份或活动。历史上重姓重名之人很多,这对我们进行人物考订有诸多不便,姚氏在其考察中就列出不少人物重姓重名二三人情况,这表现出其对于学术考订的严谨性,但是我们利用资料的时候就会迷茫,还需要重新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严密的考订分析。因此,本书对人物的考订将通过前期的资料搜集整理分析,直接将认为准确的人物情况进行梳理、条列。如,《吴革题记》所载涪州知州吴革,前人研究中多将其考订为在北宋末年抗金中死难、载于《宋史·忠义传》的华州人吴革。通过对两宋时期四个吴革进行资料的爬梳、整理、分析,白鹤梁题刻中所记载的吴革并非《宋史·忠义传》的华州人吴革,其在涪州知州任后,于南宋建立之初转仕江南,担任转运副使。^②

2. 对个别人物进行剔除。由于现今白鹤梁题刻已经沉入江底,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所保护的也只是题刻较为集中的一部分石梁,因此,在对白鹤梁题刻数目、内容的考订上出现一些不同的成果,个别非白鹤梁题刻的内容被记录在相关著述里。如何凤桐、曾超、王晓晖著述中收录的《郭德麟题记》《齐砺等题记》,通过相

① 陈曦震《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曾超《三峡国宝——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王晓晖《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黄海《白鹤梁题刻辑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14年。

② 本书附录有对吴革的详细考证。

关考察可见,两者都是江苏盱眙第一山宋代题刻,清代《盱眙县志稿》中就有明确记载,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清代学者顾广圻、瞿镛的拓本,加之对相关人物的考察,确定并非白鹤梁题记。在本书中,就剔除两则题刻所涉及的郭德麟、林磔、齐砺、龚儒密、章斯才等人。而曾超著述中的《吴克舒题记》,是涪州北岩题刻,也不在考察之列。

3. 对以往题记中相关人物识读错误进行修订。清代姚觐元、陆增祥等学者对白鹤梁题记的辑录并非全部,到了现代,学者对题记进行辑录时,一是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文字漫漶不清,二是主观判断,造成个别人名的误读。本文也对此进行修订。如《黄觉先题记》中“黄觉先”,此前几乎所有辑录都将其录做“炎觉先”,今根据《说文解字》对“黄”字的字形、字义的解释可纠正这个错误。^①

为了阅读方便,本书对人物的考订遵循简单而翔实的原则,根据所能查到的文献进行直接叙述,明确标注文献的出处,尽量不用个人描述性的语言,以避免再次造成不必要的失误。对于不能直接证明是相关人物的材料,尽管相似,也尽量不列出,只将题刻中的人物姓名及其所出题刻列出,以免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即“有疑则缺,以待能者”。

^①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5页。

目 录

绪论:长江中上游地区古代洪水枯水题刻的文献价值	1
汇考正文	17
附录一 北宋涪州知州考略	227
附录二 南宋涪州知州考略	248
附录三 白鹤梁题刻所见北宋涪州知州吴革考辨	273
参考文献	287
后记	300

绪论：长江中上游地区古代洪水枯水题刻的文献价值

学界在对中国古代水事题刻的研究,尤其在北方地区“水利社会”的研究中已取得丰硕成果,而对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题刻研究较多倾向于水位、气候、灾害防治等自然科学领域。对古代时期长江流域洪水枯水的记录,特别是洪水及其灾害的记录,在历史典籍中并不缺乏,而存留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古代洪水枯水题刻,为我们保存了极其有价值的第一手数据。

一、洪水枯水题刻基本数据

长江中上游地区发现最早的洪水题刻是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距今860年,最早的枯水题刻至少可追溯到唐广德二年(764),距今达1200余年。^① 这些具有千年时间的洪枯水数据在

^① 据《巴县志》金石篇记载：“晁公武丰年碑题记：昭德晁公武休沐日，率单父张存城、璧山冯时行、通泉李尚书、普慈冯樽，同观晋唐金石刻。唯唐张萱所称光武时题记不可复见矣。”可见，渝中区朝天门灵石在东汉光武帝时期(25—57)已经有了题刻，但无文字说明其对枯水的记载。其后晋义熙三年(407)灵石社日记未见枯水之意，唐天宝十五载(756)张萱灵石碑、乾元三年(760)王升灵石碑内容亦不得见，因此，只能以白鹤梁所记唐广德二年(764)为最早。相关记载可参见：(清)王尔鉴《巴县志》，早稻田大学藏本；(宋)陈思《宝刻丛编》，《历代碑志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国内外是罕见的。从题刻内容来看,描述洪枯水情况有详有略,大部分题刻有历史时期洪枯水的水位具体位置及发生时间。一般来看,洪水题刻大多较为简单,往往在水位最高处刻写“某年某月某日水涨至此”,或具名,或不具名;枯水题刻往往文字较多,内容丰富。

如忠县忠州镇绍兴二十三年(1153)洪水题刻“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水此”;又如涪陵白鹤梁枯水题刻群,以“石鱼”为水标来描述江水位的高低,开宝四年(971)“江水退,石鱼见,下去水四尺”,元祐元年(1086)题刻“江水至此鱼下五尺……”。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洪水题刻数目不少,涉及四川省苍溪、南溪、屏山、江安、宜宾、阆中、泸州、合江、纳溪、邻水、广安等地;重庆市巴南、江北、南岸、北碚、合川、永川、潼南、綦江、江津、长寿、涪陵、武隆、丰都、彭水、忠县、石柱、万州、云阳、巫山、奉节等地;湖北秭归、宜昌、江陵等地。洪水题刻清代以前较少,绝大多数集中在清代,其中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咸丰十年(1860)、同治九年(1870)最多,仅同治九年洪水题刻的数目就超过了100段。对洪水题刻的辑录与研究相对不多,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①和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三峡湖北段沿江石刻》^②对长江流域古代洪水题刻做了部分辑录,这些和传世文献中的记录,以及考古、调查中的辑录,在相关的研究成

①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三峡湖北段沿江石刻》,科学出版社,2010年。

果中都有所体现,主要集中在探讨洪水的灾害性影响和政府的防灾、救灾思想。

枯水题刻主要集中在今重庆市,有涪陵区白鹤梁题刻约180余段、江津区莲花石题刻约30余段、巴南区迎春石题刻约10余段、渝中区灵石题刻约10余段、江北区耗儿石题刻2段(后蜀、南宋)、丰都县龙床石题刻约70余段、云阳县龙脊石题刻约170余段,以及部分三峡湖北段题刻。与洪水题刻比较,枯水题刻内容较为丰富,因此研究相对较多,其中对重庆涪陵白鹤梁的研究颇为集中。宋代陈思《宝刻丛编》^①,清代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②,清代王应元《涪州碑记目》^③,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④,陈曦震、陈之涵《中国长江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⑤,陈曦震《水下碑林——白鹤梁》^⑥,何凤桐《宋代长江水文题刻实录》^⑦,是记载题刻内容较为全面的主要著作。曾超《三峡国宝——白鹤梁题刻汇录与

① (宋)陈思《宝刻丛编》,《历代碑志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清)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一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③ (清)王应元《涪州碑记目》,《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一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④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⑤ 陈曦震、陈之涵《中国长江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重庆出版社,2003年。

⑥ 陈曦震《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 何凤桐《宋代长江水文题刻实录》,《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1期。

考索》^①一书考校了题刻文献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近两年,又有黄海《白鹤梁题刻辑录》^②、王晓晖《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③对白鹤梁题刻做了文字整理及相关校注。

总体来看,对洪水题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历史时期洪水形成灾害及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方面,对枯水题刻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白鹤梁题刻及川江其他枯水题刻的本体研究上,侧重于题刻内容的表征,涉及人物的考察、官称的考校等方面,对这些题刻的文献价值的挖掘还远远不够深入,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洪枯水题刻与政治史研究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洪水枯水题刻文献尽管内容有详有略,但是将其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联系起来,可以进行较为深刻的探讨和分析。

1. 官制名称及变化

白鹤梁题刻记载了自唐宋以来的天量官职名称,包含了不同的称呼,这对于我们研究唐宋以来各政权官制的构成、发展变化,尤其是地方官制的发展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① 曾超《三峡国宝——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② 黄海《白鹤梁题刻辑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14年。

③ 王晓晖《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

从相关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各种官称的记载,如宋代题刻中就有如下内容。文散官有银青光禄大夫、朝奉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郎、宣德郎、迪功郎、奉义郎、通仕郎、奉议郎、将仕郎等;武散官有左班殿直、修武郎等;检校官有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工部尚书;中央机构官名有监察御史、武骑尉、柱国、上柱国、左都押衙、巡检、司徒、行尚书省部员外郎、尚书主客郎中、尚书屯田员外郎、尚书虞曹外郎、都官郎中、屯田外郎、驾部员外郎等;地方官员名称有峡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转运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知州、知军、知郡事、太守、郡守、殿直、郡从事、监征、督邮、州学教授、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县令、县宰、县尉、供奉、监税、掌狱、主簿、从事、户掾、理掾、民掾、宪掾、教授、兵马都监、兵马监押等等。

宋初沿唐制,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都是实官,赴各州任职。宋太祖、太宗收藩镇之权后,以文臣京朝官知州、府事,以上诸使成为武臣遥领不赴任之迁转贵阶,或者为亲王、宗室所带之衔。文武散官阶、文臣本官阶、文臣寄禄官、武官阶等等,在题刻文献中都有反映。

宋代知州为一州之行政长官,全称为知某州军州事,习惯上又有郡守、太守、刺史、牧、州将等别称,白鹤梁题刻文献就反映出宋代涪州知州往往出现不同的称呼。

将录事参军称为“督邮”,是宋代一个特例,这在题刻中也有反映。白鹤梁题刻《王蕃诗并序》载:“司马机才孺为涪陵督邮,实摄郡事。”司马机,字才孺,北宋政和二年(1112)以涪州录事参军身份摄郡事。督邮,这里指州录事参军,位序在诸曹参军之上。督邮原为汉代郡守佐官,掌纠举违法及狱讼等事,其执掌与录事

参军事近。^①宋代遂有将州府录事参军称为“督邮”之例。将知州称为“五马”，也在题刻当中反映出来。

2. 宋代川籍官员本地任职

北宋平蜀后，四川地区归于宋朝版图，成为宋朝统一南方的财源基地。前期，宋侧重于从富庶的蜀地征敛财物，忽略了对蜀地土人的团结和民众的安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中期以后，宋朝调整了治蜀方略，大量任用蜀人，蜀地遂社会安定，人才辈出，蜀人遂成为北宋朝廷重要的政治力量，活跃于政治舞台。尤其诏令蜀人可以在蜀地为官，也对宋代蜀地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自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平蜀至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宋初四川地区的武装斗争长达30余年，规模大，时间长，给北宋政府带来极大震动。宋初四川地区大规模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川陕(峡)选官多惮行”^②，官员们心有余悸，惧怕到四川做官。

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斗争，调整了四川地主阶级和北宋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北宋政府认识到，在四川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和团结四川的地方势力。太宗时期，因“上言者以为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因此于至道二年(996)下诏“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三年能肃静寇盗，民庶安

①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546页。

② (元)脱脱《宋史》卷三〇七《凌策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28页。

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①。从而改变了宋代初期排斥、歧视四川地区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注意联合和起用四川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共同对四川人民进行统治。同样,利用四川士人出任四川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充分利用他们对区域历史、地理、文化、语言、习惯等方面的熟悉。四川地区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改变了不乐仕进的态度,积极地入仕做官,从而促进了宋代四川地区文化的发展,也使宋代四川地区人才辈出。

宋朝在鼓励四川地区士大夫入仕的同时,还逐步解除了蜀人不能在蜀地为官的禁令,用四川人来治理蜀中的臣民。天禧四年(1020)规定,官吏中川峡有科名历任无赃罪经举荐者,三任内许一任去本贯三百里外守官。其年老致仕者,“亦听还乡”。天圣八年(1030),宋朝正式允许蜀人在本地做官。史载:“集贤校理彭乘以亲在蜀,恳求便官,诏乘知普州。蜀人得乡郡,自乘始。”^②

从题刻可以看到,北宋王朝善于利用熟悉当地风俗民情和语言习惯的四川人出任四川地区的官员,尤其是知州一级。姚涣,普州安岳人,治平元年前任涪州知州;郑顗,昌州大足人,元丰年间出知涪州;程敦书,眉州人,曾任涪、邛、普、雅诸州知州;涪州郡守朱永裔,阆中人;涪州郡守夏敏彦,眉山人;费琦,成都人,仁宗皇祐进士,神宗熙宁中通判蜀州、绵州,官至朝散郎。出任县一级官员的川籍仕人则更多。用蜀人来治理蜀地的政策,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一七七《刑法》二之六,中华书局,1957年,第6498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中华书局,2008年,第2536页。